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138-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99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維開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8 日

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

報告內容

前 言

本項研究延續筆者近年來以蔣中正為中心之研究計畫，與以往不同者為研究方向從政治活動移轉至宗教信仰，以「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為主題，探討蔣中正與其基督教信仰間的關係。本項研究計劃係筆者在從事蔣中正相關研究及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過程中，參閱相關資料後形成。筆者發現除了形之於外的崇拜外，蔣氏並以基督教信仰作為其處理國事的協助力量。本項研究擬以蔣氏關於基督教信仰相關言論、抗戰期間校改吳經熊之《聖經》新約全書及舊約聖詠集譯稿，以及戰後至來臺初期之日記為主要資料進行研究。

研究目的

蔣中正成長在一個中國傳統家庭中，母親王太夫人長年禮佛，曾自述幼年時隨母親赴寺廟之情形，然而蔣氏於 1930 年 10 月 23 日在上海景林堂牧師江長川主持下受基督教洗禮成為正式的基督徒後，基督教信仰即成為其生活的一部份。近年來，由於蔣氏《事略稿本》及《日記》等資料陸續開放，引起研究者對其私領域活動的高度興趣，其中對研究者印象最為深刻者，為蔣氏生活之規律與對基督教信仰之虔誠。蔣氏每日早起後，必做朝課，包括讀經、唱詩、靜坐、禱告；晚餐後，必做晚課，包括讀經、反省、禱告等；每週日至教堂禮拜，並曾於 1948 年 7 月將南京擴建完成之小紅山行邸捐獻為基督教堂，名為凱歌堂，來臺後亦於所居住士林官邸傍建一教堂，仍名「凱歌堂」，作為其與夫人宋美齡禮拜之場所。

除了蔣中正對基督教信仰形之於外的崇拜外，令筆者更感到興趣的，則是基督教信仰對於其處理國事的輔助性影響。其實早在《事略稿本》及《日記》之前，已經有若干蔣氏與基督教的相關文獻公開，如中正紀念堂曾經展出蔣氏閱讀並手批的《新舊約全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亦影印出版《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等，另有相關人士如親友或侍從人員的回憶或口述歷史，只是沒有引起研究者太多的注意，其中兩套蔣氏手改譯稿尤為重要。《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包含蔣氏於抗戰

後期校改吳經熊譯《聖經》《新約全書》，以及《舊約》之〈聖詠集〉兩部份手稿，吳氏於 1979 年送該會典藏；《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則為蔣氏校訂王家楫譯美國高曼夫人（Mrs. Charles E. Cowman）編《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之手稿，王氏於 1979 年將蔣氏校訂之譯稿及修訂稿送該會典藏。1986 年為蔣中正百年誕辰，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以兩稿為理解蔣氏基督教信仰之重要資料，指示影印出版，贈送圖書館及各基督教會，作為紀念。是時筆者任職該會，奉指派負責兩稿影印出版工作，整編之餘，深刻感受蔣氏基督信仰之虔誠，並對於蔣氏在抗戰期間，軍政事務繁忙之際，尚能花費如此時間，逐字逐句校正《聖經》譯稿，且不僅只讀一次，觀其篇末自記閱讀時日及眉批筆跡，每一譯本至少二次以上，深感不可思議。及至 1999 年，筆者協助李雲漢教授搜集、整理蔣中正在一九五〇年代之資料，並負責編輯《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參閱蔣氏戰後至來臺初期之日記，發現其決大事輒求助於信仰，日記中提到上帝、天父之次數頻繁，乃理解蔣氏實已將其基督信仰內化為處理軍政事務之輔助力量，而有進一步探討之動機。

筆者並非基督宗教信徒，對於處理基督教義相關問題有其困難，因此筆者希望藉由蔣氏關於基督信仰相關言論、校改吳經熊之《聖經》新約全書及舊約聖詠集譯稿，以及戰後至來臺初期之日記，探討基督教對於蔣氏在處理國事上所產生的影響，蔣氏如何藉由信仰抒解其情緒與壓力。特別是校改譯稿一事，筆者認為尤有深究的必要。蔣氏每日讀聖經，對於一位虔誠基督徒而言，是理所當然的功課，而其喜愛讀舊約詩篇（聖詠集），亦為其個人愛好。但是校改聖經、聖詠譯稿，與讀經不同，需花費相當時間；而其校改譯稿時間，在 1943 年至 1945 年間，處於對日抗戰後期，情勢雖較戰爭初起時有所緩和，但並不樂觀，尤其 1944 年更是十分危急的一年。蔣氏在處理國務之餘，尚能撥出時間校改聖經及聖詠譯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吳經熊翻譯舊約聖詠集的時間較早，蔣氏於 1943 年起曾三次校讀譯稿，逐字逐句加以圈點，遇不妥處即一一指出，請吳氏重新斟酌。《聖經》新約全書之翻譯工作則是於 1942 年開始，歷時三年完成，吳氏每譯完一篇，即送請蔣氏修正。蔣氏於校改過程中，遇到譯文有疑義者，則會以其隨身閱讀之文理本聖經相對照，並加以批註，與吳氏相商。吳氏曾撰文說明，如福音若望傳（約翰福音）第一章開宗明義的十四節，據研究原文為詩的體裁，吳氏譯為五言。蔣氏以為不妥，修正甚多，並於書眉照吳氏譯意擬了四句：「惟一聖子，無上光榮，妙寵真諦，充溢厥躬。」吳氏乃恍然大悟，將五言改為四言，而以蔣氏所書四句作為結語。再如福音瑪竇傳（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節，吳氏原譯：「吾謂駝穿針孔較富人之進天國猶易」。蔣氏以為「穿」

字大有語病，可能引起讀者誤解，以為駱駝以腳引線穿人針孔，建議改為「駝身穿過針眼」。啟示錄第三章有「如再不醒悟，吾必襲爾，猶盜之突如其來。」以盜竊比擬天主，蔣氏認為不妥，批曰：「原文雖為盜字，但漢文似可譯為敵字，未知可否？」第十六章有「我來如竊」。蔣氏批曰：「竊字或改為『密偵』，并仍註明原文為『竊』字，何如？」吳氏遂將「盜竊」改為「不速之客」，蔣氏批云甚佳。如吳氏所舉例證，閱讀影印之手稿，則可以見到更多蔣氏以紅藍鉛筆、毛筆等不同用筆的修改之處。因此筆者認為蔣氏如此勞心費時校改吳氏譯稿，不能僅由其為虔誠基督徒一事予以說明，而應進一步將其放在當時的環境來看待。筆者計劃以蔣氏校改用筆配合篇末自書各次校改譯稿完成之時間，逐一排比，與當時之對日抗戰軍事進展及國內政治情場，相互對照，希望能藉此探討除了喜愛聖經、聖詠之外，蔣氏校改譯稿之背後因素。

1949年對於蔣中正而言，是其生命歷程中重大挫敗的一年，查閱在此前後數年日記，頻繁出現天父、上帝等字樣。張玉法教授認為這是蔣氏在此期間排遣一再受挫、一再失敗之情緒的方式之一，所以「向上帝求助、向上帝懺悔，挫折愈多，上帝懺悔的時間愈多」。筆者亦認為蔣氏在此期間確實是以在日記上向上帝、天父求助或懺悔的方式，抒發自身的情緒，減輕內心所承受的壓力。但是蔣氏不止向上帝、天父求助、懺悔，也將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難，視為上帝對他的試煉，向上帝、天父感恩，如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之日記道：「本日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上帝恩德，能使余得如此順利引退，實為至幸。」是年總反省錄中記道：「本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幸存之理，而乃竟能出死入生，堅忍不撼者，實不知其理之所在，其惟朝課晚課讀經頌贊，虔誠默禱，無間一日，仰邀天父眷顧之恩，乃得抵拒魔力之試探，脫離此無比之兇險，而荒漠甘泉一書，亦與有大助於余也。在此長期敗亡試鍊之中，所恃者惟此一點之信心，毫不為之搖撼，天父有靈，其必知此苦心，而決不我負也。」1951年3月1日復行視事一週年自記：「本日為復職第一週年紀念，感謝上帝賜我臺灣安定進步，予以轉危為安之機，奠立復國雪恥基礎，果能如期消滅共匪，完成統一，建立基督教理三民主義新中國，則一切榮皆歸於我慈悲天父惟一之主宰也。」另一方面，他亦認為他為黨、國所做的一切，為天父所賜，須向上帝負責，向上帝感恩，如他於1950年1月1日自記：「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對於黨務軍事政治與政策組織教育，及作風與領導方式，皆須澈底改革，重新來過，而以復蘇實踐四字自矢，不失為基督信徒，以期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不負總理之厚望也。」

1950年7月「上月反省錄」記道：「本黨改造提案正式通過，改造委員名單亦已發表，此乃革命史中之大事，實亦本黨起死回生最後之一服單方也。此關一過，則今後革命行動當較易為乎。事前所謂獨裁與反民主之反對聲浪，與對內對外之疑慮，皆一掃而空，不可不謂熟慮斷行之效亦在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耳，是誠天父所賜也。」1951年1月31日聯合國政治委員會通過美國譴責中共為侵略者之提案，自記：「如果若此違天逆理之共匪反得參加國際，而中華民國之代表反被逐出，則除非天父真使世界末日之降臨矣。惟天父給我中華民國永為基督教理三民主義之國家，一切榮耀得歸上帝也。」因此，筆者擬就蔣氏戰後至來臺初期之日記中關於上帝、天父之相關記事，進行整理，藉以理解蔣氏如何以基督教信仰來排遣、消解其生命歷程中重大的挫敗，或許能對蔣我在1949年前後的若干作為有進一步理解。另一方面，筆者亦希望能將抗戰期間校改吳經熊譯稿一事，與戰後至來臺初期日記中關於上帝、天父之相關記事進行比較，進一步理解基督教信仰對於蔣氏之影響，以及蔣氏如何將基督教內化為其處理國事之輔助力量。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主題為蔣中正的宗教信仰，資料方面，可以分為幾個部份進行掌握：

第一部份為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前身中央黨史委員會影印出版之《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及該館所藏蔣氏閱讀的《聖經》。

《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為蔣氏校改吳經熊譯《聖經》《新約全書》，以及《舊約》之〈聖詠集〉兩部份之手稿。兩書亦分別出版有排印本，將一併參考。

聖詠集於1946年10月以「聖詠譯義初稿」為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封面上刊有「蔣主席手訂」字樣。篇前有天主教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及天主教海門教區主教朱希孟之序言，一致推崇蔣氏校改之舉措，並將此與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連結在一起，認為聖教前途將大放光明。于氏稱：「夫以一國之元首，重之以空前之戰事，竟能深思遠慮，躬親主持譯經之事，有史以來，未之前聞，今乃目覩之矣，此不特聖教之光，亦中華之幸也。」朱氏亦稱：「抑有聞吳子此譯，曾經蔣委員長，駐節陪都，敵寇肆虐時期，親在防空洞中，三次校閱云。竊以委員長當軍書旁午之秋，猶與教中人士，上下議論，汲汲以闡明聖道為務，是則吾華聖教前途，必且大放光明。」1975年4月，蔣氏逝世後，吳經熊修改初稿，於是年10月出版定稿本，以紀念蔣氏

當年修正初稿之苦心。

《聖經》新約全書譯稿則於 1946 年 9 月隨吳氏奉命出使教廷，攜往羅馬。經教廷傳信部委請于斌負責審定，于氏復請羅光及陸徵祥兩位為審查員，於 1948 年 10 月簽名審定付印。1949 年春，吳氏返國述職，特地攜帶譯文之修正稿面呈蔣氏審閱，並於返任經過香港時，交由真理學會印行，以「新經全集」為名，於是年 11 月出版，書首有教宗庇護十二世致吳經熊嘉獎其譯經完成函代序。

此外，吳經熊對於蔣氏校改《聖經》新約全書，以及舊約之聖詠集譯稿經過，撰有〈總統與譯經〉一文，收錄於《中國學術史論集（四）》（民國 45 年 11 月再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十分值得參考。

《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為蔣氏手改美國高曼夫人（Mrs. Charles E. Cowman）編《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之譯稿。《荒漠甘泉》是基督教徒的靈修書籍，採以日繫月方式，每日一篇文章。蔣氏十分喜愛閱讀該書，但以坊間流傳之中譯本，譯文多有刪節，乃委請任職中央通訊社的王家棫重譯，並親自校讀譯稿，改訂各篇次序。新訂之《荒漠甘泉》仍維持原書以日繫月、每日一篇的形式，但在每月之前附以一篇蔣氏為耶穌受難節、耶穌復活節或聖誕節所撰寫之證道詞。王氏於 1979 年將蔣氏校訂之譯稿及修訂稿送該會典藏，1986 年與《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同時出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亦藏有多本蔣中正閱讀過之《聖經》，其中一本為蔣氏於抗戰前後所讀，上面有他的圈點、註記、文字修改及閱讀時間等，十分值得參考。

第二部份為目前暫存於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中正日記》。筆者在日記開放之前，因參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劃」，有機會參閱蔣氏家屬提供戰前至來臺初期的日記，本計劃所參考者主要為此一部份。筆者當時曾向已故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秦孝儀說明在閱讀及抄錄日記時，發現蔣氏對於上帝、天父之相關記事甚多，秦氏當即表示基督信仰對於理解蔣氏十分重要，囑咐筆者應一併抄錄，日後可單獨進行一研究，本研究計劃之構思亦受此啟發。

第三部份為國史館度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之《事略稿本》。在蔣中正基督教信仰之整體理解方面，《事略稿本》實為重要資料之一，相關記事可提供參考，如 1930 年 10 月 23 日有蔣氏於是日下午在上海宋宅接受由江長川牧師主持受洗禮；1948 年 7 月 18 日於南京小紅山行邸舉行凱歌堂開幕預備典禮等。惟《事略稿本》之編者當初

引錄蔣氏日記時，大多將上帝、天父等字樣刪除，如前引 1949 年日記總反省錄：「本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幸存之理，而乃竟能出死入生，堅忍不撼者，實不知其理之所在，其惟朝課晚課讀經頌贊，虔誠默禱，無間一日，仰邀天父眷顧之恩，乃得抵拒魔力之試探，脫離此無比之兇險，而荒漠甘泉一書，亦與有大助於余也。在此長期敗亡試鍊之中，所恃者惟此一點之信心，毫不為之搖撼，天父有靈，其必知此苦心，而決不我負也。」《事略稿本》則修改為：「本年憂患重重，於內奸外敵包圍之下，而竟能出死入生，堅忍不撼者，實由於上蒼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脫離此無比之艱險，而『荒漠甘泉』一書，對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為堅定，毫不為之動搖也。」日記中「天父眷顧」、「天父有靈」等字樣完全不見。此應為《事略稿本》編者所遵循之共同原則，目的在避免外界有蔣氏「迷信」之印象，但如此則不免使研究者難以從其中審視蔣氏之宗教信仰。筆者等參與「《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畫」時，曾思考此一問題，最後決定依蔣氏日記原文錄入，不再如同《事略稿本》修改。

第四部份為蔣氏與夫人宋美齡關於宗教信仰的言論，以及相關人士的回憶。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纂出版之《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有蔣氏關於基督宗教之演講、書告等共二十一篇，其中十七篇為耶誕節（1944、1952）、耶穌受難節（1950—1961）、耶穌復活節（1962—1964）之證道詞，其餘四篇依序為〈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1937 年 3 月 26 日在南京致美以美會東區合議會）、〈中華基督教之新時代與新作風〉（1943 年 5 月 17 日招待中國基督教協進會擴大會議全體會員聚餐後致詞）、〈對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書面賀詞〉（1972 年 10 月 4 日）、〈對全球中國基督徒第一屆大會書面賀詞〉（1972 年 10 月 5 日）等，對於理解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宋美齡是蔣中正信仰基督教的最主要力量，她在〈我的宗教觀〉、〈祈禱的力量〉、〈總統的信仰〉等相關論著、演講及談話中，曾多次提及蔣氏基督教信仰相關問題，因此如《蔣夫人言論集》（臺北：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民國 66 年 12 月）等言論彙編，亦為理解蔣中正基督教信仰之重要來源。

此外，擔任凱歌堂牧師長達四十年之周聯華在其回憶錄中，（《周聯華回憶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7 月初版）對於蔣氏的信仰亦有專節陳述。長期追隨蔣氏的幕僚，如秦孝儀、曹聖芬、唐振楚、熊丸及蔣氏親屬韋永成等對蔣氏日常生活之憶述，亦提供了不少值得參考的資料。

其他如當時發行的報紙，包括《中央日報》、《大公報》、《申報》等，對於蔣氏

所發表言論均有報導，其中包括證道詞在內，亦可一併參考。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計劃之內容，筆者擬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將探討蔣中正校改吳經熊譯《聖經》新約全書及舊約聖詠集之經過，以其校改的時間與當時之軍事進展及國內情勢等方面進行排比分析；第二部份將檢視蔣氏戰後至來臺初期日記，筆者初步構想以 1948 年－1951 年四年為範圍，將其中提及上帝、天父之相關記事，視其內容歸類，以明白蔣氏對於上帝、天父之懺悔、求助、感恩、負責等不同事件。最後希望能將此兩部份內容進行比較，歸納出一個較實際的蔣中正與基督教信仰之關係。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中文方面，關於基督宗教的學術研究數量頗豐，其中又以教會歷史研究最為可觀。但是在教會歷史研究方面，以民國人物與基督教為主題者則十分有限，探討蔣中正與基督教關係之論述更少。筆者查閱林美玫著《禱恩述源－台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專書論文引得（1950-2005）》（臺北：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6 年 9 月）及金以楓編《1949 年以來基督宗教研究索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兩書，臺灣及大陸關於基督宗教研究中，僅得張慶軍、孟國祥合撰〈蔣介石與基督教〉一篇。該文內容平實，筆者同意兩位作者提出研究蔣中正與基督教關係的意義：「由於宗教與政治的特殊關係，蔣介石加入基督教，這不僅影響其個人的人生經歷，而且對中國社會也產生重要影響。研究蔣介石對基督教的態度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以從一個側面深化我們的歷史認識。」然而該篇成文時間較早，資料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所收錄蔣氏關於基督教相關講演、書告為主，夾雜若干政治態度，分析難免有所不足。2008 年 11 月，韓國新羅大學教授裴京漢於「民國人物與民國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蔣介石與基督教－日記裏的宗教生活〉一文，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9 月），參閱蔣氏《日記》探討蔣氏的宗教生活，從「與宋美齡的結婚與入教」、「個人得救和個人修養」、「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三方面，對於蔣氏為何受洗成為基督徒，蔣氏成為基督徒後如何體驗基督教信仰，以及蔣氏成為基督徒後的宗教目標等問題，有十分清楚的分析，結

論部份，作者綜合歸納了他的研究，特別強調：「基督教這一宗教信仰和教誨，無論對蔣介石個人來說，還是對政治家蔣介石的思想和行動來說，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也是以後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2010年8月出版之《民國檔案》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曉陽撰〈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與聖經翻譯〉一文，探討蔣氏對吳經熊翻譯《聖經》修訂、潤色的過程，認為蔣氏到了1940年代，聖經知識和基督教修養水平已經相當高了，「具有了可以幫助別人翻譯聖經的信心和能力」。裴、趙兩篇論文實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以及蔣氏日記的開放有密切關係，為近期內關於蔣氏與基督教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

隨著《蔣中正總統檔案》及蔣氏日記等資料的陸續公布，蔣中正研究在民國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主題。國內目前有兩個蔣中正研究團隊，一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主持，網羅臺灣、中國大陸及日、韓等國研究者參與的研究計劃；一是由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呂芳上、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共同主持的「蔣介石研究群」，以有系統的研讀《事略稿本》，進行蔣中正研究；將來可能還會有相關研究團隊出現。中國大陸及歐美、日、韓等國家或地區之蔣中正研究團隊亦陸續組成，相關研究亦大量出現，以本（2010）年為例，即有四個以蔣中正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北京、臺北陸續舉行。然而在關於蔣介石的研究中，基督教信仰及其與各個不同宗教間關係的研究，無疑是較弱的一環，但是這個部份對於了解蔣氏內心世界卻有其重要性。如侯坤宏在〈1930年代的佛教與政治：太虛法師和蔣介石〉一文中，從蔣氏與太虛法師的交往，勾勒出蔣氏宗教信仰的發展過程，指出蔣氏的宗教信仰是由佛教轉向基督教，但是其中相關問題才進一步探究必要。筆者認為本研究計劃將可充實蔣中正研究在此一方面的內容，且由於目前蔣中正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1949年之前的研究，包括前述裴、趙兩篇關於基督信仰的論文亦是如此，本研究計劃則是跨越了1949年的界限，從一個全面性的角度進行探討。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劃按預定將於一年內完成，並就研究結果撰寫論文，預期對於釐清蔣中正基督教信仰與充實蔣中正研究內容將有一定的貢獻。目前筆者已完成〈作為基督徒的蔣中正〉一文，從蔣氏關於基督教的公開言論、蔣氏在日記中所顯現的基督信仰，以及蔣氏對《聖經》的研讀三方面進行討論，藉以理解蔣中正作為一個基督

徒的相關舉措。初稿發表于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學術研討會」(2010.4.10-12, 浙江杭州), 會後依與會人士提供意見修正完成, 投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之專業期刊《史林》, 已接獲通知, 審查通過, 決定刊登。

筆者撰寫該文過程中, 對於蔣氏之基督教信仰有若干發現, 一是蔣氏對基督教信仰的態度與西安事變有密切關係。在此之前, 他在公開場合極少提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他曾於 1935 年 3 月 12 日出席重慶總理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講演, 以總理受洗一事, 說明基督徒受洗的意義, 曰:「他二十歲時在香港醫科大學讀書的時候, 曾在受基督教洗禮的那一天, 自己取了一個名叫『孫日新』。他就是取『日新又新』的意義, 立志從受洗禮那一天起, 開始來改革一切舊習慣, 從新換一個新人。畢竟由此養成其偉大的人格, 做出這偉大的事業, 創造現在這個新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作新民最好的模範!」(〈紀念總理逝世之感想與對於川省同胞的希望〉, 民國 24 年 3 月 12 日,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三演講, 頁 126-127), 但是蔣氏並未以其基督徒身份說明其宗教信仰。而在西安事變後, 他於 1937 年 3 月 26 日在南京對基督教美以美會東區合議會發表名為「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的書面致詞, 以西安事變事實為例, 說明基督信仰對其身處危難時的影響, 表示:「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對於其革命主義亦不能無宗教式之信仰心, 否則無論大小事業, 皆無所成就。」「余信仰耶穌, 將近十年, 讀經修道, 靡日或間。客冬西安變亂, 事起倉卒, 孑然一身, 被困於叛部者二週, 嘗向監視者索讀聖經, 益覺親切有味; 而救主耶穌博愛精神之偉大, 更使我提高精神, 以與惡勢力相搏擊, 卒能克服仇魔, 伸張正氣。」(〈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 民國 26 年 3 月 26 日,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書告, 頁 213-215)。這篇致詞並刊登於各報, 透過報刊的傳播, 他第一次向民眾公開說明他的基督教信仰, 並且強調信仰的力量。二是蔣氏公開宣揚基督教信仰時, 將總理、耶穌、革命連接在一起, 使他的信仰具有正當性。他於 1938 年 4 月 16 日, 耶穌復活節前一日, 應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之邀, 向全國基督徒發表廣播演講。他延續前一年講題「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作進一步的證道, 以「為什麼要信仰耶穌」為題, 闡述前一年演講首段所言「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的意義, 強調「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 是犧牲的, 是聖潔的, 是真實的, 是和平的, 是向前的, 是奮發的」。表示「為什麼要信仰耶穌」, 有下列三個理由: 第一、因為耶穌是民族革命的導師; 第二、因為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 第三、因為耶穌是宗教革命的導師。他說:「我常常研究耶穌革命精神的基礎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體會他

的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耶穌一生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又以慈悲為懷，扶助弱者，言行間處處顯出他『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國近百年來情勢，與耶穌當時所處環境幾乎不相上下，孫中山即是本著耶穌的精神奔走革命，他表示：「總理以悲天憫人為懷，融貫耶穌革命的精神，本著『博愛』兩個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著『犧牲』的精神，來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滿清的帝制，創造中華民國，完成他民族革命基業。」而根據他個人對國民革命前途的觀察，推究人心陷溺的病根，深信今後為求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社會的改進，必須提倡耶穌博愛和犧牲的精神，無論待人接物、治軍行政，以及一切的服務，總要以仁愛與和平為人生的基礎，以奮鬥與犧牲為革命的本份，「這也就是耶穌的精神所在」。最後，他呼籲國難當前，「凡我同道，應更感受『重生』的意義，抱定『犧牲』的決心，更要以耶穌為我們人生的目標，要以耶穌之精神為精神，以耶穌之生命為生命，共同一致，向著十字架勇往邁進，以求人類永久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復興，而促進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實現，亦即實現耶穌理想中的天國。這樣，方足紀念耶穌復活的聖節，方不愧為總理的信徒。」到臺灣之後，他更將信仰與反共結合，賦予基督徒更多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請求全國的基督徒在耶穌受難節當天做兩件事：一是禁食一天，將禁食所得貢獻給大陸上受饑餓的同胞；一是在當天中午，放下一切事務，為國家民族、為世界人類祈禱，「祈求上帝賜恩給我們中華民國，使我們國家民族在這存亡續絕之交，因著信心，得以團結奮鬥，克服困難，戰勝黑暗，恢復光明，重建一個基督教理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並求上帝賜福給全世界的人類，使他們在這共匪橫行赤禍瀰漫的世界，人性將毀滅的時候，能得上帝所賜予的洪恩，享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幸福」。三是從蔣氏在日記中所記，充分顯示出他對基督信仰之虔誠。蔣氏作為一個基督徒，凡事必歸諸上帝，成功為上帝的恩賜，挫折為上帝的試煉，事業不順事求助於上帝，國事前途亦問卜於上帝。而在日常生活中，禱告、讀經成為他每日生活中的固定作息，研究者指出在 1938 年底前後，蔣氏已經把禱告和讀經作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份，不過蔣氏對自己的要求可能更高，於 1946 年 10 月 27 日日記記道：「最近纔覺禱告成了習慣，以後除了『神和我、我和神』以外，在宇宙中沒有別的東西了。」是日，蔣氏方結束臺灣光復後之首次蒞臺巡視的行程，飛返上海，為何會在是日有此記述，不得而知，但是從日記可以看出，隨著時局的變化，禱告似乎成為蔣氏減輕心理壓力的舒緩劑，曾經有一天默禱五次，每次皆在十分鐘以上的情形。

而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亦查到在《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被歸為「稿佚」的兩

篇講稿，一是經由《大公報》查得蔣氏於 1938 年 4 月 16 日，耶穌復活節前一日，應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之邀，向全國基督徒發表的證道詞—「為什麼要信仰耶穌」；一是由黨史會影印《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五）中，查得蔣氏於 1947 年 12 月 21 日發表耶誕節證道詞的親筆修正稿。此外，亦發現《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三書告中，目錄部份將 1962 年之「耶穌復活節證道詞」誤作「耶穌受難節證道詞」。而查得的證道詞或修正發表時間，皆可以充實對蔣氏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筆者於該文「結語」中表示：「蔣中正作為一個基督徒，從日常生活的表現上，和其他基督徒一樣，禱告、讀經，遇到困難時求助於上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在一個絕大多數民眾仍然遵循傳統民間信仰的國家中，他並不避諱他的基督徒身份，而且也從不隱藏他以基督徒身份所做的工作，例如抗戰時期審閱修正《聖經》的譯稿，雖然有人對他的作為不以為然，認為是荒廢寶貴精力與時間，但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他抒解國事沉重壓力的精神力量，或許也正因為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才能使他渡過人生中的重重困境，建造一個美好的『新天新地』。」本文為研究計劃的部份成果，筆者目前尚在整理日記相關資料，希望再就日記中關於信仰的內容，作進一步討論。

無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劉維開		計畫編號：98-2410-H-004-138-				計畫名稱：蔣中正之基督教信仰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0	100%	篇	〈作為基督徒的蔣中正〉,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之《史林》,審查通過,決定刊登。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作為基督徒的蔣中正〉於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學術研討會」(2010.4.10-12,浙江杭州)宣讀。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已完成〈作為基督徒的蔣中正〉一文，初稿發表于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學術研討會」（2010. 4. 10-12，浙江杭州），並於會後修正完成後，投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之專業期刊《史林》，日前接獲通知，已審查通過，決定刊登。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隨著《蔣中正總統檔案》及蔣中正日記等資料的陸續公布，蔣中正研究在民國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主題。但是在關於蔣介石的研究中，基督教信仰及其與各個不同宗教間關係的研究，無疑是較弱的一環，但是這個部份對於了解蔣氏內心世界卻有其重要性。根據林美玫著《禱恩述源—台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專書論文引得（1950-2005）》及金以楓編《1949 年以來基督宗教研究索引》兩書，臺灣及大陸關於基督宗教研究中，僅得張慶軍、孟國祥合撰〈蔣介石與基督教〉一篇。2008 年 11 月，韓國新羅大學教授裴京漢撰〈蔣介石與基督教—日記裏的宗教生活〉；2010 年 8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曉陽撰〈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與聖經翻譯〉，兩篇論文為近期內關於蔣氏與基督宗教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以及蔣氏日記的開放實有密切關係。本項研究計劃與前述研究所不同者為以蔣中正作為一個基督徒進行討論，資料搜集範圍，不止於日記或聖經，尚包括證道詞等相關言論及靈修書籍的閱讀在內，且裴、趙兩篇論文內容集中在 1949 年之前，本研究計劃則是跨越了 1949 年的界限，從一個全面性的角度進行探討，對於釐清蔣中正基督教信仰與充實蔣中正研究內容將有一定的貢獻。